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陈 潇 时殷弘

[内容提要]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关键词] 日本 后小泉时代 自民党 对华外交 中日关系

[作者介绍] 陈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战略史和东亚国际关系;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战略理论和战略史、当代国际政治、东亚安全、中美两国对外战略和政策。

日本自民党在 2010年 7月 12日赢得参议院选举,标志着民主党为期不久的“执政考试”被国民宣判“不及格”,日本政权的重心开始重新向自民党偏移,未来日本的执政权有可能重回自民党之手,同时预示日本对华政策未来可能重新由这一保守党派主导。值此之际,有必要对小泉卸任到民主党开始执政为止自民党三位首相的对华外交及其共同铺垫的外交框架做出总结,并就未来日本对华外交和中日关系走向作一种战略性展望。

安倍、福田、麻生三首相 对华外交路线回顾

安倍晋三是日本自民党内强硬派头面人物之一,从政期间多次发表民族主义言论,否定历史罪责,被称为比小泉还更具鹰派色彩的民族主义政客。¹ 但是,2006年 9月在小泉安排下接任首相时,安倍面对的外交任务和可选择的战略已与其前任大为不同。至此,六年来小泉一意孤行的对华强硬外交已近乎丧尽国内支持,并且已使日本在国际上频

频丢分屡遭挫败,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有如当时的《纽约时报》社论所说:“如果安倍希望……成为受欢迎的首相,他就必须大胆冲破前任失败的外交政策,而且明显地应从修复对华关系开始。”² 因此,安倍的外交路线不能不呈现出保守主义思想与务实需要之间的妥协,或者说是一种旨在“国家正常化”的非对称战略:在对华关系和历史责任等问题上明显软化,但在“国家正常化”、修改宪法等问题上继续推进,从而一方面争取最大限度地赢取国内支持和削弱外部压力,另一方面追求满足自民党的国际政治诉求。

对外,特别是在对华关系方面,安倍做出了两项重大妥协:第一,在历史问题上收敛退让,承认“日本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留

¹ Norimitsu Onishi “Japan’s Likely Next Premier in Hawkish Stand”,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 2006

² Editorial “Shinzo Abe’s Asian Challeng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2006

下了种种伤痕,我对此深表反省”。¹ 他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示继承“河野讲话”和“村山讲话”精神,甚至说“开战的结果给亚洲人民留下了许多伤痕。包括我外祖父岸信介在内的领导人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第二,急剧推行对华缓和,上任伊始以“关于历史的较软的公开声明”² 换取了访华机遇,一举中止两国首脑五年不互访的纪录。不仅如此,他还在访华期间认可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中方表述,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同时针对中日“政冷经热”现象提出所谓“两轮理论”,即“必须努力提升政治、经济两个车轮,把日中关系抬升到更高水平”。³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建设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新型概念,得到中方认可。由此,并经 2007年 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中日关系彻底“破冰”,走向温家宝所说的新的历史阶段。⁴

在由此换取对华外交颇多收益的同时,安倍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推进了小泉时代的对外纲领。一是提出旨在争取日本大国地位、与中国竞争地缘政治影响的“大国外交”。他上台不久,便提出要实行“有主张的外交”,据此外务省基于“2005年联合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验”,大幅提升外交预算以实行“外交革新”;⁵ 同年 11月底,他通过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⁶,其实质是要形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的软性包围。他还积极谋划“四国同盟”,要以制度和意识形态为纽带塑造美、日、印、澳四国联合,访澳签署《日澳安全协议》连同发动美日澳外长级安全对话,分明图谋建设“亚洲小北约”。二是呼吁和大力推动修改宪法。2006年 11月 1日,他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发出了就任后的首次修宪声言:“我相信从捍卫日本的角度来看,这项条文(宪法第九条)必须修正。”⁷ 走向修宪的实际步骤在安倍推动下紧锣密鼓:2006年 11月,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在该党成立 50周年大会上出台;2007年 4月,自民党及公明党占多数的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允许就修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和制定相关法律。三是急迫地谋求日本“军事正常化”和“国民心理正常化”。上任仅一个月,安倍就亲赴自卫队军舰阅兵,并于 12月经国会两院分别批准后将日本防卫厅正式升级为防卫

省。他还大力推动日本国会通过新《教育基本法》规定学校教育学生“爱国”,尽可能有力地向青少年学生灌输“在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是禁忌的东西——对他们的国家的自豪”,或者说“二战后首次在课堂里鼓励爱国主义”。⁸

“安倍路线”表现出小泉政府远不具备的灵活性,既讨好了广泛的保守主义思潮,又不乏充足的实用主义态度,的确是精明的政治和外交选择。就中日关系状况而言,如果说在小泉卸任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看出应该甚或必须扭转对抗,显著改善,那么令人非常赞赏的是安倍和中国领导人一起,仅用短短一年时间就使这得以完成。这一变动还使得冰冻了数年的中日关系几乎一下子就具备了一个最基本框架,而且也是日本此后对华政策的最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可以用“友好互惠、谋求互信”去概括。福田纠夫和麻生太郎两任首相在外交上的创建性比起安倍相当有限。这既是因为安倍作为首相所处的历史位置更利于除旧布新,也是因为他们大大受制于安倍糟糕的内政加剧了的多种问题,从而不能不将主要精力投向如何稳固自民党的国内地位。

然而,福田和麻生在首相任内对中日关系的重视不亚于安倍。2007年 9月,自民党温和派福田上台,开始比安倍更深远地提升对华关系。在当年年底的访华演讲中,福田表示访问目的是“进一步巩固自去年秋天以来以强有力的步伐发展起来的日中

¹ “温家宝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谈”,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895404.html> (上网时间:2006年 10月 9日)。

² 金熙德:“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日本学刊》,2006年第 6期,第 36页。

³ Linda Sieg “Japan PM Abe’s N. Asian Summit Set Scene for Thaw”, <http://www.alertnet.org/thenews/newsdesk/T23022.htm> (上网时间:2006年 10月 8日)

⁴ 林晓光:“安倍上台后的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当代世界》,2006年第 10期,第 15页。

⁵ ShiYinhong “Putting Conflicts on Hold for New Start with Japan” *China Daily*, April 18, 2007.

⁶ 《当代世界》,2006年第 10期,第 15页。

⁷ “在第 166届国会上麻生外相的外交演讲”, <http://www.cnmb-japan.go.jp/policy/seisaku070126-1.htm> (上网时间:2007年 1月 28日)

⁸ “日相安倍要修改永不再战宪法条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 11月 2日。

⁹ 引语分别见:Anthony Faiola “Japan’s Abe Poised to Lead Offers Nation Vision of Prid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2006; Norimitsu Onishi “Japan Passes Measure requiring Patriotic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5, 2006

关系的根基,并将这一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这新层次有两个内涵。第一,利益互惠上升到精神交融:“日中两国不单单是一种由利益、利害关系联结起来的存在。日中两国是具有悠久的交流之历史的邻国,共有相互的文化和传统,共有在其中相互所由成立的基盘”,“对于深深地蕴藏于日中两国中的共同基础、价值给予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双边友好上升到推动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共同责任。演讲第四节“责任与机遇”提出“日中两国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相互友好的现状……两国已经成为影响变化显著的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方向的存在……日中两国的未来不是选择合作还是对立的问题,而是如何寻求有效的、负责任的方式寻求合作的问题”。¹ 从这篇对华政策纲领性演说中不难看出,福田对中日友好的期盼更加急迫,对中日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更高的期望。

颇大程度上归功于福田的推动,在他首相任内中日友好关系建设成效显著。特别是相隔十年之后中国国家主席再次访日,被普遍视为中日和解、抛弃小泉时代不快记忆的标志。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显然超越了十年前双方的《共同宣言》,堪称后小泉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共识”。也是在福田任内,就缠绕中日数年的严重的东海争端,中日两国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局部的原则性协议,中日间在具体的重大争端问题上由此实现了一项局部的重要突破。影响可能更为深远的是,福田延续安倍对华友好政策并予以提升,从而在日本国内朝野政党间形成了对华态度和政策方面的某种良性竞争,促使自民和民主两党在这方面更加趋同,推动了民主党对华示好,也加强了日本国内的对华友善气氛。

福田之后的麻生属于河野阳平一系,是自民党“鸽派”中的“鹰派”,对外政策态势比福田保守,对日本的大国地位和国际领导权极为重视,其外交基本围绕如何重塑日本大国形象展开。早在 2005 年 12 月,他就以新任外相身份发表长篇演讲——“我的亚洲战略——日本是亚洲的经验先驱者”,否定中韩两国使日本“坐了冷板凳”,强调“日本是亚洲的经验领袖……日本可以用经验领导亚洲”。² 他

将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当作日本获取领导地位的战略依据,秉承“价值观外交”概念,提出著名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他担任首相后,“价值观外交”一度是日本外交的一个核心,其实质是以之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然而,这项政策不切实际,不敷大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是浮言甚于实质。远为讲求实际的是与两位前任一样,麻生多次强调“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示欢迎,而不是敌视。”在 2007 年 6 月出版的《无可限量的日本》一书中,他将一节的题目定为“为中国崛起而高兴”,并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所以作为热心的朋友,我们有必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变化。”³ 他担任首相后不久,就建议在中日之间建立领导人热线联络,得到中国赞同并与中国就此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与韩国和东盟各成员国一起,决定设立巨额亚洲基金,以共同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他还较慎重地对待“毒饺子事件”,致力于防止该事件严重损伤中日关系。不过,麻生的对华态度与福田相比有明显的退步。他将福田提出的长久和理想的中日友好倒退为工具性的互惠,提出“日中友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即‘日中共益’才是目的”。⁴ 他还围绕是否认可“中国威胁论”大玩“变脸”,反复发表自相矛盾的声明,在 2009 年 5 月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更是大谈中国更新核武器对亚洲安全形成威胁。⁵ 他鼓吹“美国是日本唯一的同

¹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日本版),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fuk_1228.htm (上网时间:2007年12月30日)

² “日外相发表‘外交战略’演讲 称日本要当亚洲领袖”,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08/content_3893196.htm (上网时间:2005年12月10日)

³ 张智新:“麻生太郎上台中日关系如何演变”,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8089161.htm> (上网时间:2008年9月25日)

⁴ 麻生太郎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上的讲话:“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实践先驱、思想先行者”, <http://www.cn.emb-japan.go.jp/fpolicy/seisaku051207.htm> (上网时间:2006年1月5日)

⁵ 张智新:“麻生太郎上台中日关系如何演变”,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8089161.htm> (上网时间:2008年9月23日)

⁶ “麻生为何快速‘变脸’鼓吹中国威胁论?” <http://world.people.com.cn/GB/9274867.htm> (上网时间:2009年5月11日)

盟国,因此与美国的关系显然要重要得多”,¹并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通过高层互访很快形成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共识,²其实质是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有所进展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华军事防范。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的成因、特征与两难

日本的国内外形势变迁是后小泉时代日本对华外交的根本动能。如果说小泉在上台后一段时期,仍有机会借冷战后日本国际环境宽松、国内左派衰落的形势对华蛮横妄为,那么他的三位继任者却已面对甚为不同的环境。当初,冷战后国家角色重新认定的意识有力浮现,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民间都响起了强烈的“政治正常化”呼声,自民党精英盼望在新世纪肇始之际能带领日本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美国的显赫强势更是令紧跟美国的自民党主流近乎有恃无恐。然而,未过多久,小泉时代外交的各项弊病显而易见,支持保守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被挥霍殆尽。最关键的变动在于,与日本经济陷入长久难以挣脱的低迷状态同时,勃然兴起的中国出现在日本西邻,如何在感情、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对待国力日强的中国成为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日本上到执政者,下至一般民众,普遍对中国崛起感到迷茫,无法深刻理解这一崛起对日本的意义。过去那种“日强中弱”、言行少忌的状况不复存在,日本在享受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利益之际,难免为东亚“权势西移”感到紧张。随着中国权势的持续增强和日本对中国市场依赖的不断加深,小泉式外交政策的成本将越来越大,乃至无法承受。

与此同时,随着 2005 年秋天往后中美合作和协调的显著扩大和加深,美日同盟的定位和意义有所变化。美国已不要求日本像过去协助遏制苏联一样全方位地钳制中国,却担心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会祸害变得远比过去重要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在东亚的全盘利益。于是,美国方面前所未有地对日本有关历史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种种批评,正是日本的这种态度构成中日政治对抗的首屈一指的缘由。”美国在谨守其东亚军事同盟体系的同时,乐见中日关系相当程度的改善,而将美日同盟当作实现“政治大国

化”战略支点的日本,也无法独断专行地违背美国的此项意愿。换句话说,中美关系越有进展,与中国交恶的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就越尴尬、越困难。不仅如此,随经济持续不振和政局经久不稳,日本全国的政治关注已严重内向化,一度兴盛的保守主义思潮归于平静,自民党殊难以惹起对华争议来显著拔高选民支持率;相反,任何领导人都能期望搭乘中日友善关系的现成“巴士”在政治上得分。

因此,日本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在国内动能与国际形势、日本诉求与中日友好之间找到平衡。如此,就形成了后小泉时代三位首相对华外交具有连续性的基本特征:(1)无论情感上是否喜欢,也无论作为工具还是目的,都充分重视对华关系,认定对华友好势在必行;(2)暂时搁置某些极难解决的重大争端,在阻力小得多的经济、文化、科技、卫生、教育等领域稳步推进中日合作,以便取得易得的成果;(3)认识到谋求中日互信的重要性,并且愿意在可行情况下努力培植这一互信;(4)认可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乃至对世界的重大积极作用,并且总体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予以支持;(5)在战略层面懂得将追逐大国地位这一目标与较好的对华关系结合起来,试图探索一条非但不严重冒犯中国、反而能借助中国认可的大国之路。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根本目标与手段之间较灵活的协调,较务实地划定了日本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国际政治环境没有重大变更的未来可预见时期内,这一基本框架很难根本动摇,因而中日大致友好互惠和谋求互信已成大势所趋。

可是必须看到,在自民党的根本政治诉求与上

¹ 张智新:“麻生太郎上台中日关系如何演变”,<http://world.people.com.cn/G/1029/8089161.htm> (上网时间:2008年9月23日)

² 2009年2月希拉里访日、麻生访美,双方均强调“强化美日同盟”;“麻生与希拉里会谈一致表示强化美日同盟”,http://www.stm.cc/pacific_asia/200902/t20090218_980960.htm (上网时间:2009年2月18日);“奥巴马会麻生:强化美日同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5/content_10894842.htm (上网时间:2009年2月25日)

³ 佐利克、阿米蒂奇等官方显贵和约瑟夫·奈等对外政策思想界要人都敦促日本较好地对待历史问题。2006年4月,副国务卿佐利克公开表示“对因靖国神社等问题恶化的日中关系感到强烈担心”,建议“为缓和日中间的紧张关系,由日中美三国的历史学家共同研究日中战争的历史”。见张景全:“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当代亚太》,2006年第9期。

述对华外交框架之间,将长期存在一定的内在紧张和矛盾。因而,无论该党能否夺回政权,该党领导人都必须创建出某种更加精细、全面、可行的对华战略,特别是切实应对如下几个两难困境:(1)坚持自身意识形态和“国家正常化”目标,又要避免为此严重影响中日友好特别是中日互信的推进;不会放弃这一目标,但追求过程中难免中日间严重猜疑甚或就此对峙;(2)遏制中国国际权势增长的成本过高且难有根本成效,予以认可则近乎(从东京的角度看)拱手让出东亚阵地;(3)大为软化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能够消除外部压力,但很有可能招致内部保守势力和部分民众的责难;倘若立场严重倒退,则势必毁坏业已取得的近邻外交成果。现在很难预言自民党的未来领导人会有相应的智慧、勇气和运气,能够经久有效地应对这些两难,甚或找到并走通合理的出路。

中日关系战略性展望

中日关系在过去四年中有了显著的改善和发展,确立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基本框架,并且今后长时间内大概将按照这框架发展下去。然而,两国关系仍然面对需要共同克服的重大难题。首先,中日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由历史宿怨和民族心理造成的彼此敌视的心理鸿沟远未填平。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国民认同两国友好互信的重要性,但确立这认同显得困难重重。正如福田坦承的那样:“从日方来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一下子显现在眼前,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而中国同样的也面对在国际社会力求承担更大战略作用的日本,也有更加复杂的心态,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实践起来却并非容易。”¹其次,近年来中日经济关系出现了某种“冷却化”迹象,中日贸易增长率为 12% - 14%,大大低于中国外贸总额 20% 以上的增长率,也远低于中国与美国、欧盟及其他主要伙伴的贸易增长率。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与中国的见解和立场相异,对华投资明显缩减,这些都阻碍了经济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双方尚待在经济、能源、科技等方面加强沟通,确立更加宽松、开放的互惠模式。

最后,很大意义上且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是,在安全和战略问题上如何创设和增进互信,如何妥善地处理、至少冷却双方在东亚海域实质上的军事对峙,如何争取大大缓解甚或最终解决东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如何各自或共同建设性地对待朝鲜半岛基本局势,如何真正使得对方相信自身的和平发展立场,并且创设和巩固某种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

在中国方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应简单地以“零和博弈”理解中日关系,而应尝试站在东亚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高度,对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和基本尊严的日本诉求予以适当的理解、容忍甚或有条件的支持,探求一条更加稳固和更具前景的中日友好之路。就当下而言,至少可以尝试做出以下努力:继续深化对日经济、政治合作,特别是促使日本在中国对日投资、对日移民和赴日旅游方面进一步放宽政策,同时注意及时地对日方的合作给予“报酬”,以增加这种合作在日本国内和自民党内的说服力,并且增大逆转当前中日关系大势的成本;稳步建立中日军事对话机制,扩大双方军事交流,创设和增强军事互信,减少彼此间的战略猜疑;妥善处置事关重大和势必经久的争端,分门别类地寻求符合双方的合理利益和可接受的局部协议,防止任何局部具体问题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特别是严防因争端而形成重大军事对抗乃至军事冲突;携手拟制处置中日间突发问题的“危机管理机制”,寻找长效、有序的应急方法,避免单个事件的不利影响过度扩大;在国际议题上寻求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在东亚共同安全、应对和防止金融风浪、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重大疫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努力达成双边外交协议,甚至建立双边组织机制;切实推进两国在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特别是加深民间交往和青少年交往,培育中日友好的民意基础。

中国政府领导人一向主张从战略高度对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在至少近 10年来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话语体系当中,这是最具远见和气概的内

¹ “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日本版), 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fuk_1228.html (上网时间:2007年12月30日)

² 高洪:“徜徉在中日关系的春光里——福田首相访华后发展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当代世界》2008年第2期,第20页。

涵之一,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对日政策思想传统当中尤为可贵和根本的一条。这一战略高度无疑是就中国对日政策和日本对华政策各自本身应有的方向和内在轻重缓急次序而言,而且实际上也是就绝大多数时候一种应有的基本主从关系而言,那就是中国对外战略大局与中国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据此,就不能不想到当前(乃至可以较明确预见的未来)的中国外部直接战略环境,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环境。

在这些地区,尤其从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战略挤压和外交竞争可称紧锣密鼓,进展连连。由此,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是这么一番地缘政治图景:中美两国在各大中国近海地区的战略对立和军事矛盾急剧地近乎全面凸显;美韩军事同盟随半岛局势的阵发性紧张步步强化,以致现已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的可谓唯一最紧密的军事同盟;日本民主党政府被迫在冲绳美军基地争端上对美全盘退让,同时放弃争取与先前相比较为平等的日美关系;东南亚国家已与美国相伴,发动对中国与其之间的南海争端的美国公开干预,并且在东盟主导的旗号下,将美国正式引入东亚/东南亚多边国际体制以“平衡”中国。¹更广泛地从世界“棋局”看,中美关系已由2009年初以来两番颇为急剧的上下波动表明了它的结构性局限,俄罗斯对外政策近来明显地朝靠拢西方的方向移动,²印度谋求美国青睐和坚持对华“竞斗”的态势难以变更,欧洲则陷于金融严重羸弱的困境之中,中欧关系历经数年低迷而仅初见明显改善。上述区域的和全球的战略环境图景必须引起中国的战略深思,连同必需、可行、慎重而又坚决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适当改变战略关注和政策努力过多地集中于对美关系的倾向,加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全方位外交,坚持不懈,同时牢记中国在未来时代的根本目标——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世界强国,牢记亚洲(首先是广义的东亚)是中国为此必需的首要平台。”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去加以谋划与应对,大大有助于中国在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亚关系中的战略优化和政策优化努力。

在日本方面,国内政治议题总的来说固然比中

日关系一般占更优先的地位,但日本政界和政府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两类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稳固的国内政治基础是良好的对华政策的根本保证,而良好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又能够巩固政权,造福日本经济和日本安全。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首要任务都是如何应对日本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内部历史性变化,包括农业人口锐减、老龄化加速、社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新思潮兴起等等,以重塑或增强其国内政治地位,获取新的支持力量。它们还需吸取过往几届内阁的教训,争取消减政治腐败行为、派系倾轧、家族政治盛行等弊病,以弥补“领导真空”,朝着较健康的方向革新政党组织、日本政治乃至日本外交。就日本外交而言,特别关键的是日本朝野都应认识到,日本外交观念必须变革,要抛弃历史认知、自我认知中众多错误的成分,敢于反省历史罪责,将“反省自身”和“大国地位”统一而非对立起来,以取信于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并且争取逐渐制定和实行一种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和平对外政策。当日本真正决心走上这种合理的外交路线,并且因此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基本尊严和应有地位时,它必能从中国得到充分的理解、相应的尊重甚而衷心的支持,中日友好就将具备至关紧要的长久保障。○

(责任编辑:黄昭宇)

¹ 上述大多数事态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的高度关注和密集议论为众周知,关于最后一项事态可参见:Mark Landler “U. S. Challenges China on Island Cha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0; Greg Tonde “Warship Sinking to Dominate Regional Summi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2, 2010 “中国不满美国涉足南中国海争端”,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20100724-US-China-99165309.html> (上网时间:2010年7月26日)

² “奥巴马已大为着力于他和梅德韦杰夫的个人接近,白宫则将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改善列为总统的对外政策成就之一。”参见:Howard LaFranchi “Russian Spies Case: There Goes the ‘Reset’ of U.S.-Russia Relation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29, 2010; Frank Ching “Russia Rethinking Its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the World”, *The China Post* July 21, 2010. 另见:“Russia’s New Foreign Policy Puts Business Firs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4028020100525> (上网时间:2010年7月1日); Owen Matthews and Anna Nemtsova “The New Putin Profile”, *Nasweek*, June 12, 2010.

³ “美国全面深化亚洲战略布局,中国应沉着应对挑战”, <http://www.phshangbao.com/show.asp?id=4421&cil=11> (上网时间:2010年7月22日)